**沈家本历史文化园：一家乡村博物馆表达的法学家宦游史**

李勇

**摘要：**所谓宦游就是为官而游，游中求宦。沈家本的宦游有其特点：写诗、写日记、交友。

**关键词：旅游史；宦游；沈家本**

如果说历史是回忆的话，沈家本历史文化园表达的个人旅游史就是对法学家作为宦游人生涯的回忆。

宦游是古代士人为求官或做官，‌离开家乡拜谒权贵、‌广交朋友的旅游。‌这一概念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有着深远的历史背景。春秋时，鲁国孔子，带着弟子周游列国，游说诸侯，希望得到任用。孔子死后，他的门人编辑了《论语·子张》，收入孔子门生子夏的话：“学而优则仕”。后世庸俗儒家的教育目的就是入仕做官，原始儒家是将教育和旅游结合起来，为社会大治服务，求得“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的机会——孔子一心想恢复回复周礼。战国时，孟轲历游齐、宋、滕、魏等国，曾为齐宣王客卿。当时，各种学派的人物游说诸侯当官，成为风气。苏秦、张仪、商鞍、尉缭、李斯等，皆为官而游，游中求宦。再后来，有了终南捷径：人为了实现个人政治理想和社会地位所进行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遁入名山大川，假归隐。其实，‌宦游不仅是一种地理上的迁移，‌更是一种心理和文化上的迁移，‌体现了古代士人对学问、权力、‌名誉和社会地位的追求。‌

宦游必须交友。《论语》：“友直友谅友多闻”。‌宦游人，‌即为了作官而四处交友的仕子，‌或者已经为官但被派到远离京城或家乡的官员。‌一般来说，‌宦游人都是在仕途上不太得意的。‌在他们宦游的过程中，‌写下一篇篇著作，‌文学也得到了长足发展。‌

以孔子周游列国为原型，‌宦游也与古代的文学创作的“怀才不遇主题”密切相关。《汉书·司马相如传》：“长卿（司马相如的字）久宦游，不遂而困。”‌许多著名的文学作品都是作者在宦游过程中创作的，‌这些作品不仅记录了作者的旅行经历，‌也反映了作者对当时社会、‌政治、‌文化的深刻思考和感悟。‌例如，‌写“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杜少府之任蜀州》）诗句的诗人王勃，他的一生就很不得志，而且20多岁就死了。怀才不遇的诗人们，有的不遇于人，有的不遇于时。‌

总的来说，‌宦游是沈家本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不仅关乎个人的仕途、法学研究和诗文创作，‌也深刻反映了清代社会晚期的政治、‌文化面貌和士人的精神世界。

旅游对于宦游人而言是家常便饭。沈家本在北京写作《小园诗》（闲适诗系列）期间，表现了宦游人“动静结合，静中有动”的特点。

**（一）法学是工作场所学习**

考秀才、举人和进士不用学习法律，沈家本的法学是在刑部任职期间学习的，属于工作场所学习。沈家本认为立法须立善法，而要立善法须由精通法律、专门的立法者为之。

1995年，《未来之路》书中无处不展示着作者比尔·盖茨的预言智慧，又由于此书中所涉及的内容与我们工作、学习和生活休戚相关，所以1996年此书进入中国，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立即掀起了一个舆论高潮，并迅速成为畅销书。该书第九章名为“教育：最佳投资”，用另一种眼光看教育。

如今已是后喻文化时代，正如比尔·盖茨在 《未来之路》意书中所言：“你的工作场所和你关于教育的观念将被改变，也许被改变得几乎面目全非。”故此，古典教育面临的时代挑战将是非常巨大的。

**一）苦难面前，草民何为？**

如果把中国封建王朝的历史看成一部民族兴亡史，有人认为“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如果把中国古代史看成是“一治一乱”的循环往复，那么大家都明知：治的时候用刑，乱的时候兴兵。在“刑兵社会”里，苦难多还是幸福多？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1.苦难之“苦”**

《荀子·劝学》：“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劝善是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内容。大诗人屈原在楚辞中叹息：哀民生之多艰。“苦难”不仅是文学的母题，也是慈善文化研究的母题。

中华刑罚史里充满了“苦难”母题。古代中国的酷刑：宫刑、黥刑、斩首、腰斩、剐，等等。现行我国刑法中还有46个死刑罪名，古代中国的死刑罪名应该是这个数的五倍以上。

**2.如何解脱**

中国古代宗法社会，宗教思想十分流行，宗教和中医，对苦难的解脱有效用。

**3.积极慈善**

孔子曰：“学而优则仕”，儒教讲究积极入世。很多士人，在进取顺利的时候是儒家，在遇到逆境的时候，是道家。即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慈善史领域，从制度化慈善入手，笔者读了邓拓的《中国救荒史》。笔者认为，如果从荒政研究中看出“消极慈善”，那么，古人办学实践中的积极慈善才是中华慈善文化的代表，体现了好人担当。由于皇权不下县，草民行使慈善自由权的空间有了保障，办学、修路、恤孤、助葬......不一而足。

**二）草民是如何被赋予慈善自由权的？**

中国历史上，兵灾给百姓带来的苦难很多，和平年月很少。作为慈善历史研究者，直面苦难，才可能“接着说”，而不是躺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上睡大觉。

苦难母题的慈善文化研究很有意义。历史上的宗教慈善、中医慈善、慈善思想、慈善人物，都指向一句话：寻求免于苦难的自由。而这种自由，是少数统治精英的，不是劳苦大众的。

研究中，又有一句话：慈善自由权保障下的技术自由，这是大多数草民的。草民是如何获得这项自由权的？原因有三：

其一、劝善，不管是宗教劝善，还是法律劝善，抑或道德劝善，都是赋权。

其二、劝农，中国古代统治者都有重农思想，颁行了一系列重农抑商的政策法令，对于农业技术创新，持鼓励态度。

其三、劝学，官民齐心发展教育、推广圣贤之道，是统治者的责任，也是朝野共识。在学校里，有知识、有闲暇时间思考问题的人，往往会搞点技术创新。

关键问题来了，技术自由和慈善有关吗？

先说反对派的二类意见：1.西方立场的反对派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科学，草民的技术自由没有科学价值。中国古代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数理逻辑科学文化，中国古人的技术创新——以中医为代表——经常不被西方数理逻辑科学所认可。2.儒教立场的反对派认为，“自天子至于庶民，一是以修身为本”才对，技术创新是旁门左道，君子不齿。圣人之徒不能本末倒置，追求技术创新，所以，技术自由跟慈善无关。

再说赞成派的二类意见：1.西方立场的赞成派认为，中国古代有科学，以四大发明为代表、以农医历算四个领域为主，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增进了社会福祉，提升了方伎人士的社会地位，可以认为是传统慈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道教立场的赞成派认为，“技近乎道”，发展道医，是治病救人，当然是慈善。

笔者是赞成派。

**三）农医历算领域的技术进步也是慈善？**

黄道婆（宋末元初）、李时珍（明代）、甘德（战国时期）、祖冲之（魏晋南北朝时期），分别代表了中国古人在农医历算四个科技领域的极高水平。

古代中国长期以农业立国，草民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所以农学家众多。黄道婆（1245年？—1330年？）的名声主要在于她传播了先进的纺织技术，并做了改进。道婆（还有医婆）在古代社会是身份很低贱的人，有此好名声，并名垂青史，足以说明她行了大善事，才有此口碑。

中医呵护了中国人几千年的身体健康，居功至伟，却在近代被西医认定为“不科学”，遭到排挤。其实，中医作为民间医学不进庙堂也罢，可是中医界人士始终不服气，非要挤进“科学殿堂”，中西医之争至今还在持续。

“人算不如天算”，人副天数，天人相通，是古人的信念。所以，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其实就是占星术，因涉及“天机”，具有神秘性和非法嫌疑。详见江晓原教授的成名作《天学真原》。江先生对星占学（占星术）的定义是：“仰观天象以占知人事吉凶之学问。”

中国古代数学家也不少，往往和天文学家“合体”，比如汉朝人张衡（78年—139年）、南北车时期的祖冲之（429年－500年），既是数学家也是天文学家。

中国古代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往往不是草民，是朝廷命官。他们所从事的历、算这两门学问研究，也和百姓生活比较疏远。

以上，笔者把古代中国人在农医历算领域的技术进步贡献，极简单地罗列出来，至于这些事算是科学教育资源吗？应该是吧。

**（二）旅游=精神成人的过程**

成人世界是儿童世界的领导者。当代成人教育领域的古典教育是风向标：人文性和历史感如何朝着“纯认知”发展，由此可知。

当今做阅读推广最成功的案例，是樊登读书APP，该公司的广告语称：帮助3亿国人养成阅读习惯。

2019年11月15日，由优酷新知与樊登读书APP联合推出的《樊登讲论语》，在优酷独家上线。《樊登讲论语》由樊登主讲，每周五更新1集，系统阐释《论语》的264章节。

“知识付费”时代的成人教育把正说里的“苦难”说给公众，取得了广泛的共鸣。樊登读书会处在激烈的“知识付费”市场竞争中胜出，固然与“滤除了古典中的苦难”有关。滤除后，就成了类似射箭游戏一般的“纯知识”。

孔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论语·八佾》，《樊登讲论语》之君子之争）

在对准读者“纯粹求知的乐趣”这一鹄的发力的过程中，樊登读书会想走一条复古以开新的路子，打开当代阅读推广和成人教育的新局面。本文则不为了迎合受众趣味，而是为了探究古典奥义。

二本《樊登讲论语》是为了致敬孔子和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第一本是《樊登讲论语：学而》（2020），第二本是《樊登讲论语：先进》（2021）。都是由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

简洁的封面介绍语显示出书籍对读者友好，一言以蔽之——

《樊登讲论语》：让你把鲜活的中国智慧用起来。

樊登把知识分为两种：智慧型知识和力量型知识。以《论语》为代表的四书五经属于智慧型知识，而现代自然科学则属于力量型知识。樊登认为：后者应该从属于前者。

樊登认为，做教育最重要的是点燃他人纯粹求知的乐趣。这也是樊登读书会的理念。这和古代书院的教育理念趋同。

古代书院属于民办，它渊源于佛教禅林和私人藏书楼。

其为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 （《元史·选举志一·学校》

书院式的办学，追求区别于科举考试求为“人上人”的学习纯粹性。樊登读书会所追求的，也是区别于被迫阅读的纯粹求知的意志。

做教育创新要研究教育对象。樊登读书的传播对象是成人读者，包括商界人士和宝妈们。成人求知很难“纯粹”，因为——

1.成人是经过了青少年时期应试教育“洗礼”的人，他们在基础教育阶段，多年以来形成的被动学习惯性，还很有力。

2.成人学习者多为在职人士，主张“学以致用”，所以，学习动机很难纯粹。

3.成人学习者已经社会化，社会角色多重，“被主流化”的学习，也就是工具性学习所裹挟，一旦有了求职之外的其他目的，读书求知就变成了工具、跳板。

4.工作场所学习，是组织化的学习，目的是建设学习型组织，一般都有个体求知兴趣之外的组织目的。

**（三）隐文化传统**

在希尔斯《论传统》一书中，新的实质性传统尚未取代旧有的传统就会产生“失范”。当代中国就处在“失范”时期。在这个时期，我们尤其要挖掘“仁义礼智信”“智仁勇”等传统美德，并且，弘扬它。这是一种慈善使命。

古典文学有教化功能，古人经常用小说做劝善之事。

文学弥补了经学的功能空缺。不过，在劝善方面，文学和经学的指向不同。经学里的“善”向上的，指向“庙堂”，以君王、君子等有位者为主，劝他们正心诚意、仁民爱物、以民为本。

文学里的“善”指向老百姓为主的受众。比如《三国演义》里的“义”，无论是“桃园三结义”还是“关羽义释曹操”，都指向民间。

在义务教育教材语文课本里，中国古典作家的代表是范仲淹，他的作品《岳阳楼记》是艺术性和教育性相统一的代表，这篇名作是范仲淹被罢去参知政事而贬官河南邓州时，应好友滕子京之请而写的传世名篇。其实，历史上的范仲淹也是位大慈善家，当然，他的思想里面掺杂着迷信。

《水浒传》所揭示的宋朝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是文学、法律和迷信交织在一起，首先是法官（执法者）搞迷信活动。

《水浒传》开头就讲宋仁宗时，瘟疫引来的“祈禳”。并没有提及宋徽宗时的大奸臣高俅，相反，提到了大忠臣、慈善家范仲淹。

《水浒传》讲的是宋朝（960～1279）的内战，其实，外患也不少，北和西北地区民族矛盾也越来越激烈。1126年-1127年，开封城中发生了一场连绵一年的大瘟疫，金兵攻取开封后，继续南下，宋政权偏安江左。

说范仲淹是参知政事，正碰上京城瘟疫流行，范仲淹建议找天师张真人前来京城禳灾。

《水浒传》第一回：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北宋末年，朝政腐败，发生了瘟疫，为了禳灾，洪太尉来到江西信州龙虎山的一个道教殿宇，命人掀开了大青石板，误将108条妖魔放出。

第二回，借住持真人之口，说：

此殿内镇锁着三十六员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共是一百单八个魔君在里面。

**（二）**

慈善释放了中国传统诗教中“苦难”的教育功能。

中国古人心目中的“善”，是“忠孝节义”那一套。在内容和称谓上，与当代不同。在慈善观念方面，古典文学承担的是面向民间的教化功能，与经学面向“庙堂”不同。它们形成了相互补充的关系。

**一）人文教育功能**

当代著名作家王蒙有一个观点，他说读了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感到中国有这么好的词，就是想做中国人。

哪怕仅仅为了欣赏辛弃疾的诗词，下一辈子、下下辈子，仍然要做中国人。”——王蒙：《旧邦维新的文化自信》

抗战大片 《八佰》中有《定军山》（三国戏）、《长坂坡》（三国戏）、水浒传故事，说明古典文学对现代人影响很大。

三国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孔子的后人孔融被曹操杀掉（事发于208年9月26日），理由是孔融“违背孝道”。其实，在“乱世”魏晋南北朝，“以孝治天下”都是基本国策。

文学家孔融（153年－208年），“建安七子”之一，家学渊源，是孔子的第19世孙，太山都尉孔宙之子。

古代著名的“二十四孝”中，发生在晋朝就有五个。晋朝朝廷想要忠孝一体：“求忠臣必于孝子”“资于事父以事君”。明朝大清官海瑞（1514年-1587年）骂嘉靖皇帝，治罪的时候，大理寺等衙门按照“儿子骂父亲”来定他的罪。

我们今人认为忠孝几乎毫不相干，可是古人认为它们是一回事，都是“善”。

**二）善知识论的知识供给**

从善如登，而劝善缺失古代诗教传统。中国诗学里的“善”，比比皆是，《吕氏春秋·本味》里形容艺术境界的高超，有一句“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

“善哉”是古人的口头语，相当于现代汉语“好的”“很妙”。中华慈善文化是寄寓在文学作品中的。

在古代，文学家都是读书人，都是背诵《论语》《孟子》《诗经》长大的，对性善论非常熟悉。

“善”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描述的是“道”。“道性善”，因为道的品性是善的，所以性善论就是道善论。

《诗经》是儒家基本经典，为它做注解的《毛诗诂训传》将孝友解释为：“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友”。

《文心雕龙》认为，文学创作应该讲究“原道、宗经、征圣”，把古典文学往“道性善”上指引。

用文学作品中的善来教育读者，由于“弱者道之动”。以下，我们来看古典文学里的弱者形象。

**1.妇女**

封建社会妇女地位低，很多文学作品里都在宣扬“红颜祸水”的观念。以《红楼梦》为代表的古典名著中，很多悲剧人物都是妇女。《孔雀东南飞》里的刘兰芝，《窦娥冤》里的窦娥，《水浒传》里的金翠莲，《红楼梦》里的晴雯，《梁山伯与祝英台》里的祝英台，等等。

**2.农民**

白居易《卖炭翁》里“心忧炭贱怨天寒”，农民伐薪烧木炭，却卖不上钱。

**3.灾民**

古代中国多灾多难，灾民很多。比如上文引用的清代赈济灾民的诗歌，慨叹了灾民的遭遇。

**4.儿童**

古代中国，儿童和妇女的地位都很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是古代儿童启蒙教育用书，也是儿童文学作品。

在古代，《三字经》不仅是启蒙教育用书，也是儿童文学作品。

**5.老人**

《水浒传》里李逵的老母亲被老虎吃掉，《红楼梦》里的刘老老被戏弄，等等。

**6.残疾人**

《三国演义》曹操之父曹嵩是老一代宦官领袖曹腾的养子。《金瓶梅》一书中有薛公公、刘公公、何太监、花太监等几个宦官，他们与西门庆勾结，形成了罪恶关系。宦官也是残疾人，他们出身贫贱，为了有口饭吃，净身当了太监，其中，只有郑和、刘瑾、李莲英等极少数人在历史上留下了姓名。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自述自己怎样受了宫刑，成了残疾人。

“物极必反”，极其卑微贫弱的宦官，也有可能成为权倾朝野的“九千岁”。比如《三国演义》里的“十常侍”。明朝末年，“站着的皇帝”刘瑾带领阉党搞出了《东林党点将录》，仿照《水浒传》108将，把东林党人指为乱臣贼子。

刘瑾(1451年-1510年)。毛泽东爱看《法门寺》，他注意到剧里的小太监贾桂，刘瑾让他坐下，他说：“我站惯了。”

古典文学中，有令人同情的弱者，也有令人唾弃的弱者。残疾人是古代典型的“弱势群体”，在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

**三）《孟子》、《三国演义》共同的缺点：没有重视工匠精神和兵器技术**

中国古代文人“重德轻艺”，不仅孔孟如此，《三国演义》也是这样，不重视工匠精神和兵器技术。

我国古代科学有农医历算四大门类，工匠辈出。《孟子》考察的主要是政治史，所以忽略了技术史。

工兵，铺路架桥，非常重要，在《三国演义》里没有地位。

曹操杀了华佗。他被今人誉为“医圣”，也是工匠精神之祖。

**（三）**

**一）和正说不一样，小说里的“苦难-慈善”，和女性形象有更多的相关性**

女性与慈善有特殊关联，这是正说和小说的不同之处。比如，在《陌上桑》和《孔雀东南飞》里，展现了中国古典文学中女性的善良魅力。

为了说明中国古典文学中女性的善良魅力，以《陌上桑》和《孔雀东南飞》（原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为例。前者注重“礼节”，后者注重“情义”，这些，都属于“妇德”。

叙事诗《陌上桑》是汉乐府民歌的名篇，富有喜剧色彩的韵文。

这首诗的主人公罗敷，《孔雀东南飞》也提到她：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贤女罗敷

一直以来，大家简单地认为太守调戏罗敷，而被罗敷义正言辞地回绝，其实没那么简单。这首诗里，太守作为地方最高长官，在春季时行所主县，劝民农桑，振救乏绝。让人想起《牡丹亭》里杜丽娘的父亲杜太守，这个父母官也不值得大家称颂，可是他履行了“劝农”职责，是值得肯定的。

从诗文中可以看出，秦罗敷显然是一个大美女形象，劳动者看到她“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太守因她的美貌也被吸引，疏忽了礼节。当然，太守是儒者，不同于普通农民，应该“非礼勿视”，但是他没有做到。

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年几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使君谢罗敷：“宁可共载不？”罗敷前致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孔雀东南飞》

和罗敷相比，《孔雀东南飞》里的刘兰芝就很悲催。“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夫妻双双死去，虽然死后“合葬华山傍”，终究是一场人间悲剧。

罗敷和刘兰芝，都是美丽善良的女性，前者因为丈夫奔赴前线打仗而独守空房，后者因婆婆和娘家逼迫而投水自杀，各有她们的不幸。这类不幸，更加反衬出故事主人公的美丽善良。

**二）越过《三国演义》的刘关张，去看《孟子》的“仁义”**

在战国这样的乱世，做圣人很难。有一些人去隐居，但是孔子、孟子不然，他致力于学术研究和教育活动。

《三国演义》“桃园三结义”讲的“义”和《孟子》的“义”相比，更接地气，但是层次比较低，不是高层次的“道义”、“仁义”，而是低层次的“信义”、“义气”。

**物的表达**

“君子博物”一词，很早就见于《左传》《尚书》，泛指那些学贯古今、通晓文物文献的收藏家。结合高罗佩的实际情况，这个词应该改为“君子博览”。本文所选高罗佩具有代表性的中短篇小说，从旅游文化学角度剖析这些小说的特点。

位于浙江湖州市吴兴区西塞山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沈家本历史文化园（北面有沈家本墓），2023年被认定为浙江省第一批乡村博物馆（认定名称：沈家本法治文化陈列馆）。“博物”作为一个词，最早在《山海经》就出现了，它的意思是能辨识多种事物；《尚书》称博识多闻的人为“博物君子”；《汉书·楚元王传赞》中也有“博物洽闻，通达古今”之意。截至2022年，中国现有备案博物馆6183家，其中91%免费开放，现代博物馆体系基本形成。

**诗的表达**

唐代大诗人李白喜游冶和饮酒，他的名作《山中与幽人对酌》即表达了这两种爱好：

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

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

宋代改革家王安石 《次韵酬宋玘》之三：“游冶水边追野马，啸歌林下应山君。”

**一、工作儒学模式中的休闲之美**

作为晚清京师法律学堂创始人的法学家沈家本（1840-1913）是一名儒者，他既是经师又是人师，秉承的是工作儒学，认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但是，在他的工作儒学中，有一部分却和休闲美学有交集——旧体诗歌（韵文）。这一点，尤其在晚年居家著述期间，体现得淋漓尽致。

按照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人老了就要辞让，给后人留位置；按照制度安排，也有“休至”等规定，晚年武职解甲归田，文官告老还乡。晚清社会变化很大，北京枕碧楼——而非浙江湖州老家——是沈家本辞职后的养老之所。故此，他的《小园诗》亦可定性为侨寓文学。

沈家本被目为法学家、法律改革家，《历代刑法考》是他的法学代表作，1912年，收入《沈寄簃先生遗书甲乙编》的甲编（中国书店影印出版），1985年中华书局出过一版，最近的一个版本是201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上、下册。38万7千余字，上溯唐虞，下止于明清，内容包括《刑制总考》、《刑制分考》、《汉律摭遗》、《历代刑官考》、《刑具考》、《狱考》、《明大诰峻令考》等。在京写作《历代刑法考》的过程中，沈家本已经不在刑部和修订法律馆任职，而在枕碧楼家居、深研法学，期间并没有停止作诗。他一生留下来600多首诗，代表作《小园诗》二十四首就创作于《历代刑法考》写作期间。这种“劳逸结合”是与他的“经师-人师”人格结构形成了互文关系。

**（一）法与刑**

**一）知人论世**

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沈丙莹（1809—1864，字菁士，浙江湖州人，道光乙巳进士，授刑部主事，历官监察御史、安顺知府）进士及第、分配至刑部。此前，1840年沈家本出生那年，爆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1859年，沈家本遇上了影响中国历史的两件大事：太平军席卷全国，英法联军逼向北京。这一年，他的父亲被简放到贵州安顺。为了躲避战火，沈家本第一次挑起家庭重担，奉母携弟往北京郊外的西山避难。

听说僧格林沁在通州击退英法联军，北京可以安全度日，沈家本又带领全家回到京城。到家不久，才知其实不然，只得再次逃难。

清咸丰九年八月初九（1859年9月5日）。沈家本作五律《初九日复出都感赋三章》：“刚报平安火，星躔遇角张。将才推卫霍，国是问汪黄。幸陕思唐室，征辽感宋皇。艰难膺重寄，宏济仗贤王。竟卖卢龙塞，空闻血战鏖。乘轩难使鹤，升木孰教猱。密画中行策，虚持属国旄。凤城天尺五，杂虏任游遨。刁斗严军令，勤王尚有兵。前茅孙叔将，细柳亚夫营。感慨谁投笔，阽危欲请缨。桃源何处是，山墅计行程。”

咸丰十一年（1861）二月二十五日的五律《病中见桃花》。其诗曰：“为问卷帘人，桃花开也未。料有隔墙春，和风送香气。折来三两枝，想象云台侧。插我胆瓶中，浓淡认春色。”

1895年康有为等发起“公车上书”。当年，集合地点就是杨椒山祠（松筠庵），位于现金井胡同一号沈家本故居往南二三百米东侧有个达智桥胡同南侧的12号。杨椒山就是明代著名谏臣杨继盛（1516－1555），字仲芳，号椒山，直隶容城（今河北容城县北河照村）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他上疏力劾严嵩“五奸十大罪”，后遭诬陷下狱。在狱中，杨椒山备受酷刑而不改其词，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遇害，年仅39岁。明穆宗即位后，以杨继盛为直谏诸臣之首，追赠太常少卿，赐谥号“忠愍”。

**二）礼教传统下的历代刑法**

有论者认为沈家本是新法家。因为，在《历代刑法考》中，沈家本认为，法律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

**1.法**

在《历代刑法考》中，沈家本引用《尔雅·释诂》：“律，常也，法也。”以《历代刑法考》为代表，清人的考据学是“照着说”，既是对孔孟的尊崇，又是学者儒教信仰的表达。

法就是辅助性的社会规范，是用来禁止强暴不法、除暴安良的。“法”的本义指刑罚，引申而指法律、法令和法律制度。在古代中国，“法”和“礼”都是对人行为的规范；“礼” （礼教）旨在扬善；“法”（刑罚）旨在惩恶。战国时期，产生了以商鞅（前390 ？— 前338，商鞅变法分两次进行，第一次开始于公元前356年，第二次开始于公元前350年）、韩非子（前280 ？—前233）为代表的法家学说。

**2.刑**

《庄子·内篇·养生主》：“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

刑起于兵。法家主张：“以刑止刑”。儒家强调：“刑期于无刑”，认为：采用刑罚的目的在于消灭刑罚。此乃“德政”思想的延伸。因为儒家认为，礼乐教化是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刑罚是一种不得不采取的辅助手段，对死刑发动用极刑必须由天子决断。沈家本就曾在刑部秋审处任坐办，负责死刑核准、奏报皇帝。

**3.墨**

墨刑即刺字,就是古代的“墨辟”,又称“黥”刑。“五刑”之一的黥面是肉刑的一种，就是在罪犯脸上刺字并用墨色涂抹，既是肉体折磨又是人格羞辱。《后汉书·朱穆传》记载，东汉时期有一位汉桓帝宠爱的宦官赵忠犯法了，大臣朱穆就去调查验证。汉桓帝很生气，判朱穆去服劳役。京城的几千名太学生上书，为朱穆求情，述说朱穆所作所为都是“竭心怀忧，为上深计”，并表示“臣愿黥首系趾，代穆校作”。有人以此便说这证明黥刑在东汉又用上了。而沈家本认为，“此太学书生刘陶等上书讼穆语，殆设言之辞，非尔时尚有黥首之刑。”这并不能说明黥面之刑在东汉时就有了。在《历代刑法考·刑法分考七·墨》中，沈家本认为黥面复现于西晋的《晋令》：

“奴婢亡，加铜青若墨，黥两眼后。再亡，黥两颊上。三亡，横黥目下。皆长一寸五分，广五分。”

“（南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年）诏：自今强盗抵死特贷命之人，并于额上刺‘强盗’二字。余字分刺两颊。......今刺‘强盗’当自此始。”

总之，中国古代，礼法合治，道德与法律并重，德主刑辅，法律是为了辅助教化，是第二性的。

**（二）闲隐诗事的历史文化价值**

归隐老夫，人淡如菊。先欣赏沈家本的三首诗：

**菊**

徙倚东篱菊未开，三弓地辟雁初来。

西风正紧红逾艳，也傲秋霜竟不摧。

**兰**

幽兰几朵苞初放，便觉香来分外清。

何若仍归空谷去，让他群艳斗繁英。

**梅**

喜占卦气一阳开，人事天时且漫猜。

惟有眼前风景换，将舒岸柳放山梅。

“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盛世无隐者，衰世隐者多；大隐隐朝市，小隐隐山林。即便侧身朝堂，也有一些儒者以隐士为道德标杆。“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是孔子在《论语·季氏》中的论述。宋明理学、颜李学派所出之处——书院作为儒教经学院，隐没于山林之中，就是“君子谋道”的隐修院。孟子主张“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也把退隐作为失败儒者的归宿。

长期供职于刑部，沈家本对于刑部的工作是不满意的。晚清的司法系统充斥着大量不懂业务的政治官僚。而作为技术官僚的沈家本严厉批评一些官员不懂法律而滥竽充数，沈家本认为立法者应该做到：“度长短者不失毫厘，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权轻重者不失黍素。”

整理这篇诗事学术年谱并做文化教育反思，是为了例证“写诗是沈家本的工作儒学”，且越到晚年，这项工作越重要。写诗是沈家本的终身业余兴趣——这是主流的“业余爱好说”。笔者不同意。

沈家本的主子慈禧太后（1835-1908）也写诗，其中留存后世并被经常引用的就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出自她的七言绝句《祝母寿诗》。为什么她的诗比她本人“形象正面”？这是因为儒家诗教内属于儒学，儒学不允许“形象负面”的语句，因为那样会有违圣教。

**（三）《历代刑法考》写作前之诗事**

咏史与感时，是沈家本早年经常写的诗歌主题，也是1909年11月13日成立的南社，其领袖柳亚子诗歌的重要主题。

沈家本在组诗《咏史小乐府三十首》中，他通过“守冢高皇置，云沉大泽乡。中原多逐鹿，首事伙颐王”、“大义亲忧灭，休腾卖友讥。公言杀诸吕，血溅汉臣衣”等充满历史情结的诗句，表达了他的家国情怀。

在《走笔》一诗中，沈家本写道：“身世篷飘梗，光阴斧烂柯，百年忙里促，王安泪中多。酒好不能饮，诗成空自歌。囊余一长剑，依柱几摩挲。”沈家本对大厦将倾的清王朝，感到十分焦虑，手抚长剑，大有从军报国的心愿，然而家庭与自身的条件，使他只能“诗成空自歌”。

沈家本四岁随父亲入京。在第二次出京时，沈家本在《九月复出都感赋三章》之三中写道“刁斗严军令，勤王尚有兵。前茅孙叔将，细柳亚夫营。感慨谁投笔，阽危欲请缨。桃源何处是，山墅计行程。”

在《九月初一日口占》中他表达了当时的屈辱心境：“楚囚相对集新亭，行酒三觞涕泪零。满目山河今更异，不堪说与晋人听。”

**二、“与世无争许自由，蠖居安稳阅春秋”：小园诗事**

《小园》是南宋诗人陆游（1125—1210，浙江山阴人）创作的一组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创作于淳熙八年（1181），表达了对少年理想的否定和对村居田园、隐居生活的享受。如《小园》之四：“少年壮气吞残虏，晚觉丘樊乐事多。骏马宝刀俱一梦，夕阳闲和《饭牛歌》。”

陆游所生活的南宋，金兵衅边，偏安江南，世风日下，古道难循。在战事影响下，容易形成刑兵社会。

**小 园**（四首之二，作者：陆游）

小园烟草接邻家，桑柘阴阴一径斜。

卧读陶诗未终卷，又乘微雨去锄瓜。

村南村北鹁鸪声，刺水新秧漫漫平。

行遍天涯千万里，却从邻父学春耕。

**（一）辞职家居著书、写诗**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大清一败再败，不变法没有出路，这是朝野上下共同的看见。随之，晚清有两类“改良型”维新变法：一类是著名的百日维新，以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而告终；一类是沈家本、伍廷芳主持的清末修律，以伍廷芳出国、沈家本辞职、辛亥革命爆发而告终。

**一）没有“卒于任”**

明清历史上很多诗人“卒于任”（例如，清代第一个文正公汤斌就卒于工部尚书任上），显得很敬业，成为工作儒学的人格典范。沈家本没有“卒于任”，但这并不是他人格的瑕疵。

沈家本晚年才达到法学史意义上的人生巅峰，一是参与了清末修律运动，担任修订法律大臣、创办京师法律学堂、主持北京法学会和出版《北京法学会杂志》；二是写了法学代表作《历代刑法考》。

1911年，迫于朝廷中礼教派官员的诸多指责，沈家本辞去修订法律大臣与资政院副总裁的职务。此后不久，清政权覆亡，沈家本拒绝民国政府要他出任司法总长邀请，闭门隐居，专心著述。

1912年，沈家本修律活动的一个副产品的《历代刑法考》由中国书店影印刊行。书中《狱考》指出，监狱在古代有不同的称谓，夏曰“夏台”，殷为“菱里”，周为“囹圄”，而当初设监狱的本意并非“害人”，而是“幽闭思愆”、“改善为恶”（应为“改恶为善”），“以感化为宗旨”，这也与当时的新学说相契合，沈家本因而感慨：“名理自在天壤。”

从变法史看，沈家本《历代刑法考》＋《小园诗》在鼎革之际堪比谭嗣同的《仁学》。

**二）闲适诗与史事无关**

历史学家陈寅恪讲究“以诗证史、诗史互证”，这种方法已经将诗歌不在当做文学体裁，而是宗教性书写，内容的真实性很高。比如今人们热衷的“从小说中发现历史”更加可靠。

但是，在闲适诗中，历史、社会和生活事件的记录就很难寻迹。如沈家本的同题诗：

**荷**

陈迹重寻处，蹉跎十九年。

荷花依旧好，香气落尊前。

**荷**

观荷曾上水边亭，败叶萧萧尚满汀。

欲觅秋声何处是，尽教留向雨中听。

**（二）儒家闲趣与道家仙味：沈家本对刑兵社会的消极反思**

古代中国主流历史观有二：历史循环论：历史是“一治一乱”的循环，治时用刑，乱时兴兵；二是历史退化论，认为“人心不古”，言必称“三代”、法先王，如今的世道人心不如远古。

从休闲美学角度看沈家本的《小园诗》24首，可见它们并非“用不同花木的的特性衬托他复杂的思想感情”（沈厚铎，2020）。这是工作儒学和讽喻诗学的论调，笔者不取。沈家本的《小园诗》以园中二十种花木为友，继承了儒家隐者闲雅诗风，摆明了是以陶渊明、晚年陆游为伍。

**一）特点**

回忆与怀旧是老年人的生活特点，在回忆中将晚年与少年的人生做比较。与陆游的《小园》组诗相比，“闲”字是很显著的共同点。《小园诗》二十四首是沈家本《历代刑法考》写作期间诗事的代表作。

《小园诗》第一首：

小园蚤诵兰成赋，吾爱吾庐拓数弓。

但得眼前生意满，不须万紫与千红。

作于1912年的《小园诗》二十四首之二《桃》:

嫣然一树倚东垣,露蘂烟梢护画旛。

海内风尘还未息,不知何处是仙源。

在《小园诗》中，沈家本怀念起故乡老屋的情景及江南:

　　也有三竿又两竿,闲中对此念家山。

　　檀栾树影墙头出,风雨潇潇户自关。

**梅花**

 梳枝冷落暗香含,雪后时开花两三。

 杜老乡愁在何许,定随清梦到江南。

在《水仙》(《小园诗之十九》)中写道“玉骨冰心冷不催,素姿闲冶出尘埃。”读来，令人不禁遥想唐诗《风雪宿芙蓉山主人》：隐士破屋前的刘长卿歌咏“天寒白屋贫”之冰冷与“柴门闻犬吠”的道德侧消极公民理想叫醒了群山。

桃园不仅指的是文人雅士隐居佳处，也指的是仙家所居的妙境。发出“不知何处是仙源”的问语，就是把桃花源看作是仙人所居。这让《小园诗》体现出道家仙味。

《小园诗》二十四首之六：

**夹竹桃**

新妆翻与古为徒,劲节秾华影共扶。

 舍得三分春意思,一般写入岁寒图。

枕碧楼的前院本有两株丁香，沈家本将它们对照着写:

**丁香**

一株枯朽一株荣,开谢都参造化情。

白后红先香不断,更看由枿自萌生。

**朱藤**

朱藤分植院东西,锦绮如棚暑气低。

新旧但能参一性,千条万蕊密阴齐。

**二）生活实况**

《小园诗》的最后二首离开小园花而直言生活实况，例如生病:

名都赫赫走英豪,病骨支离不耐劳,

 独许闭门观物变,高吟坡句首频搔。

　　《小园诗》的最后一首:

与世无争许自由,蠖居安稳閲春秋。

小楼藏得书千卷,闲里光阴相对酬。

宛若隐者，在空闲中，枕碧楼小坐，独自斟酌小饮。

**三）小结**

“国家不幸诗家幸”。这些表露儒家闲趣与道家仙味的诗，可以看出沈家本对刑兵社会的消极反思。

沈家本生于动荡的衰世，制度下行的压力之下，在朝为官，与人斗争，他是个失败者；旧制度的破船修修补补已难有一帆风顺的豪迈，屡屡败于洋人让社会上的革新思潮日盛一日。幸好，旧制度中除了礼教还有诗教。在考据学与诗书中自适，赋闲家居，与诗酒书籍为伴，著书立说写诗明志。对于沈家本而言，写诗、做学问和做法官都是在圣教中享受自由。作为科举制度的受益者和慕强变法的失败者，沈家本都在诗中表达了内心感受。1911年辞去修订法律大臣之职，《历代刑法考》1912年面世，这是沈家本晚年的心血之作。修订法律并没有换回“列强撤销治外法权”的预期结果，在部院之争、礼法之争中败北，外在的斗争失败和内在的老年心境，加之学术成果日丰，让他的《小园诗》二十四首尽显悠闲自得之态。

在《水仙》等组成的《小园诗》中，沈家本接续了魏晋隐士的诗风，即便有唐风宋韵，也没有边塞诗和豪放派的范儿。如：

 白头还喜见深红,照眼霞光五月中。

我与柳州同一叹,却成古木对哀翁。

在贫穷而简朴的生活中醉心学问，以隐居者自况，表达了沈家本不与流俗同道的向往。闲隐诗事，表明隐者沈家本的心志仍在旧制度中，他没有跳出舒适圈，没有突破儒教的文化园地，依旧“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鲁迅《自嘲》，作于1932年）年岁大了，枕碧楼外的世界对他而言已经“满是尘埃”，不隐居避世不利于养身。

**三、诗教与中国现代化之初的法美学**

上文论述了晚年沈家本于修法失败后闲居北京枕碧楼的小园诗事。无论得志不得志，沈家本都有读书写作习惯。他对于道学、诗学和法学都是真爱，并非只将它们当成获取功名利禄的工具。

《诗经》是儒教基本经典之一，是每一个清朝读书人必读的教科书。尤其是应试的举子们，更要熟读成诵，然后才能在考场上“子曰诗云”地答题。孔子十分重视诗教，他曾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在私塾里，“对课（对对子）”是基本的教学内容。

**（一）诗礼传家**

1861年，沈家本《十二月初八日由铜仁赴长沙道中作》：“又别卢阳去，悤悤逼岁华。宦途成苦海，流寓当还家。尘世风波恶，江湖日月赊。桃源经两度，洞口锁烟霞。”

1883年（光绪九年），沈家本考取进士后，“自此遂专心法律之学”。

1902年，经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三位总督保荐，沈家本61岁出任大清修律大臣。迫于内外交逼的形势，“中华法系”内的《大清律例》这部中国近代刑法迈向它的历史终点。

1905年，向清廷上奏《删除律例内重法折》中，沈家本参酌各国刑法，建议废除“凌迟、枭首、戮尸、缘坐、刺字”等酷刑并禁止使用刑讯逼供。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沈家本整理了祖父沈镜源的遗著《蓼菴手述》。

1907年，《大清新刑律草案》完成，引发“礼法之争”，沈家本为首的法理派失败，张之洞为首的“礼教派”得胜。

1908年(戊申)，沈家本在百忙之中,先是整理了父亲沈丙莹的著作《星匏馆随笔》,随后又整理了三弟沈彦模(子范)的诗稿《看山楼草》、五弟沈家霦(子文)的诗稿《松桂林草》。沈家本上《奏请编定现行刑律以立推行新律基础折》。京师法律学堂在北京正式开学。

1908（光绪三十四年），沈家本已是68岁的老人,修律工作正在加紧进行；部院之争虽无结果,但也算告一段落。然而《大清新刑律》草案引起的礼法之争却成轩然大波。只是学术的辩论,沈家本有足够的学识与同道者,可是有些辩论带有了阴毒的人身攻击,沈家本先生虽然胸怀坦荡,但也不免幽幽郁闷。正好日本福田二村啸庵先生来函催诗,于是写下了《答日本二村啸庵》以明其志:

　　海上鱼书迢遞至,新诗展卷几回看。

　　遥知圆峤方壶际,松柏青青耐岁寒。

　　匆匆忽过两年春,逝景频催白发新。

　　我与梅花清一样,世人漫笑在官贫。

**（二）言志和缘情：君子之道的闲雅**

孔孟之徒沈家本旧体诗歌中除了体现“诗言志”的思索，还有“诗缘情”的闲情雅致。

**一）沈家本的诗歌艺术**

沈家本写诗是在彰显其儒者身份，向经学致敬。

**1.终身写诗**

新旧杂陈的晚清，“新旧但能参一性，千条万蕊密阴齐。”（沈诗写朱藤），趋新向洋是晚清中国社会的风气，沈家本却一生没有模仿外国诗，没有写过新体诗。

在此，看看诗人沈家本临终前的感慨吧：

**梦中作**

可怜破碎旧山河，对此茫茫百感多。

漫说沐猴为项羽，竞夸功狗是萧何。

相如白璧能完否，范蠡黄金铸几何。

处仲壮心还未已，铁如意击唾壶歌。

这首诗的尾联被展示于现浙江湖州市沈家本历史文化园二楼展厅。诗中提及铁如意（笔者在张宗祥纪念馆里见过）。据说，艺术品铁如意（展陈中见了文字，没见实物）虽然不是兵器，海宁人张宗祥（1911年做过晚清大理院推事）却拿它驱赶过盗匪。

沈家本的诗并不是当代纯文学意义上的“纯诗”，韵文写作是儒家诗教的产物，知识分子用“写诗”表明他（她）的文化胎记和儒教（或其他宗教信仰）背景。

**2.诗学与经学**

诗教是儒学的基本内容，而不是儒教附属品，它就是儒教本身。因为《诗经》是四书五经之一，是儒教元典，诗学内属于经学。

笔者参观沈家本历史文化园，在墙壁上看到了他的诗句。当代沈家本研究中，诗学的地位被大大低估了。沈家本写了600多首诗，还创作诗话。《沈[寄簃](https://www.baidu.com/link?url=6oQf2Z2om2GFhocSA2DSbuB3h7pQuBTTztFIVWHECXcLBw0wWxGMshZWFfvE5MC9gcWs8xw-OyrgA1H38W3_Va&wd=&eqid=9f7cb40a0017788d0000000565e047df" \t "https://www.baidu.com/_blank)先生遗书》里还有小学（语言学）著作。

文学具有认识功能。通过文学作品理解沈家本这位法学家，有审美作为中介，别具优势。

**二）当代沈家本研究与文学**

传记文学家朱东润（1896—1988，代表作《张居正大传》）教授认为：

古代中国是有过不少政治人才的，他们在那时的环境里，都曾做出伟大的贡献，在二十四史和历代文人所作的神道碑、墓志铭、行状等等里都有很好的叙述。是不是可以在这些作品以外，吸收国外传记文学的成就，作出一种新的尝试？我想是可以的。

“吸收国外传记文学成就”以及当代中国传记文学成就的《沈家本新传》是当代沈家本研究的重要成果。这是一部文学传记，是沈家本的后人所著，也是审美中介，利于读者“同情的理解”。用文学的方式呈现沈家本这个历史人物，与接受美学非常吻合，也使得这本著作读来很有趣味。

**（三）“刑法与自由”的法美学之思**

**一）知识的美**

没有功名利禄间隔，知识的美就向学者显露。

比沈家本早，戴震（1724-1777）也是考据学大家，他在《孟子字义疏证》中提出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在儒学史上留下了一笔。在《历代刑法考》书中，每章节文末的“论曰”都表达了他自己的看法，这是学者的一片自留地。就如同《史记》中的“太史公曰”和《聊斋志异》中的“异史氏曰”。

知识的美在于会通。《历代刑法考》中记载了沈家本关于“中西会通”的论点，与鲁迅的论点“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类似：

大抵中说多出于经验，西学多本于学理。不明学理，则经验者无以会其通；不习经验，则学理亦无从证其是。经验与学理，正两相需也。

**二）逼近的美**

沈家本一身三任，法官-考据学家-诗人，引发了笔者的法美学之思，那就是刑法与自由——这不是距离产生美，而是因为逼近才产生的美。

沈家本主张废除酷刑和刑讯，认为本着“仁”的精神，向列强的现代刑法体系靠拢、看齐，这才可能让列强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捍卫我国的司法主权。人权是西方法学思想的核心概念之一，自由是人权的核心价值。

在《玉骨冰心冷不摧：沈家本诗集》代后记中，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沈家本四世孙沈厚铎认为：“沈家本先生虽对音韵、格律很有研究，诗作以格律诗为主，但也喜作古体诗和乐府诗。这是因为古体诗和乐府诗相对比较自由，不受诗词格律限制，更易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这里提及“自由”，仅仅在诗歌艺术层面。这是不够的。

法律是辅助性的，刑法是教化的工具。和“距离产生美”的生活美学不同，刑法美学是一种“逼近之美”，是带着技术含量和好奇心的审美。对于管理主义而言，没有刑罚就没有秩序。而对于美学与美育而言，没有刑罚就没有自由——因为自由是以边界感为前提的。去除管理主义的偏见，就能达于刑法美学的自由佳境。

依靠灵感的诗歌创作是向往自由的，而刑法却在剥夺人的自由。艺术、文化之于法学研究和教育的重要性，在沈家本身上可见一斑。

古代刑法对人身自由的束缚比如今严酷得多。比如枷刑，从当代出版的画册上披露外国人拍摄的图片，可见清朝时期带着枷站立在街道旁边的受刑的犯人。这还算轻刑，重的刑罚是徒刑，关进监狱；流刑（比狱中服刑的人数还要多），流放到关外僻远之处，如清廷把科场舞弊案犯带上刑具流放到黑龙江宁古塔。唐代大诗人李白曾因投靠反叛的永王李璘被判处流放，后中途被赦还。

在古代严刑峻法惩罚体系的逼近之下，自由之美更加珍稀而价值凸显。沈家本的诗之美，又是自由的彰显，这种彰显的心理基础，在于他晚年对隐者传统和闲雅诗风的追慕。

**三）享受自由的人是关键**

清朝败亡与《大清律例》是否落后无关，而与大清统治阶级这帮人相关。法律人是法律是否有效的根本，法律的实施在于人。《历代刑法考》认同荀子“有治人无治法”的观点，认为，宽缓的刑法如果严苛之人执行，也会没有宽仁之效。请看《历代刑法考·刑制总考三》：

“甚矣！有国家者，非立法之难，而用法之难也。......益可知有其法者尤贵有其人矣。大抵用法者得其人，法即严厉亦能施其仁于法之中；用法者失其人，法即宽平亦能逞其暴于法之外。”

同为教育工作者，法学家沈家本从事诗歌创作与哲学家梁漱溟（1893-1988，有“中国最后一位大儒”之称）从事乡村建设不同。后者“将农民变成经济的战士”（《乡村建设理论》），前者将法律人变成儒雅的君子。兴学办教育推行仁义、恕道与友爱，二者是相同的。

可以说，在《历代刑法考》中，凝结了对知识的少年野心，为这野心提供心智保障的，是老年隐者的精神自由。不过，这种具有贵族气息的隐者之风，能不能给中国当代法学教育输入松弛感？政法院校的美育工作者当思之。

科研是闲出来的。兴趣和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它们让人可以享受求索、创造的自由。沈家本对法学的热爱成就了《历代刑法考》。如今，作为知识生产者、社会服务者，政法院校应该增加松弛感的教师文化和校园文化供给，可以给师生增加享受自由的福利。

**四）1911-1912年的中国与沈家本小园诗事之“纯”**

自由、民主、共和是舶来品，却让中国变了天。沈家本的刑部同僚、思想保守的吉同均（1854-1936，37岁中进士，曾参与晚清变法修律、创办京师法律学堂，陕派律学代表人物之一）写有一诗，工作儒学情绪慢慢，颇不闲适：

**自感**（作于1912年）

廿年辛苦一场空，回首家山入梦中。

肯使折腰求五斗，宁教枵腹啖双弓。

惊闻楚水恶氛起，忍见燕山王气终。

 六尺血躯三尺剑，男儿当学岳精忠

**1.第一种自由：光复中华，从满清奴役下翻身**

1911年（宣统三年）是旧历辛亥年，是年10月南昌起义爆发；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宣告成立，是年2月12日，清帝爱新觉罗·溥仪颁布退位诏书。该诏书由状元张謇起草，尾部盖着皇太后“法天立道”的闲章（并非皇帝玉玺），落款处有袁世凯、沈家本等11位大臣姓名、官职，司法大臣沈家本的名字由别人代签。诏书大部分是骈体文，正文尾部有“皇帝得以退处宽闲，悠游岁月”等字样。朝野发生这么多大事期间正是改良主义者沈家本隐居之年。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清朝第十二帝）颁行的《大清现行刑律》36卷和《钦定大清刑律》都作废了。

1911年，最值得一提的中国诗事就是南社二位社员因革命而被杀事件。是年11月17日，诗人周实（1885-1911）被江苏省山阳县知县姚荣泽骗至淮安府学杀害。当日晚些时候，诗人阮式（1889-1911）也被杀害于府学附近。革命胜利后，中华民国政府抓捕了姚荣泽，最后由江苏省高等法院判了刑，入狱后姚荣泽托关系，没坐几年牢就出狱了。

南社负责人柳亚子等人为二位诗人编辑了诗歌遗集，孙中山为周实送的挽联这样写道：

喋血于孔子庙中，吾道将衰，周公不梦；阴灵绕淮安城上，穷途痛哭，阮籍奚归？

**2.第二种自由：脱去工作儒学的缠累**

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以“三纲五常”等教条为核心的传统价值观崩解，“敬天法祖”的儒教成了博物馆文化，只具有展陈价值。脱去工作儒学的缠累，末路上的贵族们迎来了休闲美学新时代。

在沸腾的革命年代，诗社都成了革命团体，而沈家本的诗没有主流的“热”，而是另类的“冷”；没有讴歌，而是闲咏。相较于南社诗人柳亚子、周实和阮式，沈家本的小园诗更“纯”。

五年后的1917年，在白话文运动兴起后，现代“纯诗”观念开始席卷中国文坛，写诗不再是孔孟之道信仰文化立场的表达，而是情感心智多元化的表达。去除了传统文化“魅力”的纯诗，文言变白话，格律诗变自由体，定位于文学创作之下的一类文体实践，定性为语言的艺术。